

重庆军统集中营死难人员烈士资格审查过程考略

王浩¹, 金华²

(1.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 400043; 2.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 重庆 400065)

摘要:1949年9—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台湾前对关押在重庆军统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系列大屠杀,死难300余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西南局与重庆市委成立专门机构对死难者的烈士资格进行审查,确定了第一批235名烈士名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再次组织力量,对未定性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进行复查,64名死难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关键词:重庆;军统集中营;烈士;资格;审查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7)02-0031-04

1949年9—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处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实施了系列大屠杀,“死难者总数达321人”^{[1]80}。新中国成立后,309名死难人员先后被各地各级人民政府评定、追认为革命烈士。目前,由于资料匮乏等因素,学术界还未对重庆军统集中营死难人员烈士资格审查的过程进行详细、系统、准确的考证。面对这一研究空白,笔者在查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大量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分两个历史时期对烈士资格审查的过程进行详细考证。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大规模烈士资格审查

在1949年的重庆军统集中营系列大屠杀死难人员中,有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车耀先这些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有很多不知名却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为了给死难者一个交代,社会各界认为:除了隆重召开追悼会以外,还应该把他们评为烈士。然而,由于死难人数众多,有些人在政治上有问题,不能简单、笼统地把全部死难者都认定为烈士。为了慎重对待此事,“西南局与重庆市委决定,对死难人员进行政治审查”^{[2]199}。待审查完毕后,再召开追悼会。

(一)成立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

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由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

张姓副部长担任主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魏思文任副主任;据《新民报》报道,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还邀请了邓照明、肖泽宽、王永福、刘兆峰等9人审查烈士名单;讨论到某些死难人员是否应被评为烈士时,也会邀请知情人士,如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等人参加讨论。审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七星岗忠烈祠街的一座楼上。据《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记载:“审查烈士的标准计有三项:一是生前斗争经过;二是被捕后坚贞不屈;三是英勇就义。”

(二)审查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成立和审查烈士标准确定后,审查工作正式展开。然而,审查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诸多困难和巨大挑战。“由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规定上下级之间只能单线联系,有的党员担负的是机密任务,不为外人所知,如果断了联系,就无人能证明;有的同案人员全部牺牲,也无人能证明;有的遇难者只留下籍贯,有的使用的是化名……”^{[3]47},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几乎把所有材料都销毁或者带走,这些客观因素给烈士资格审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为了早日召开追悼会,给死难者一个交代,审查委员会工作人员不分白天黑夜,连续奋战,在1950年1月15日前确定了第一批236名烈士名单(确定的名单中有一位同志并未牺牲,故实际只有235名烈士)。事实上,当

收稿日期:2016-10-19

作者简介:王浩(1984—),男,四川遂宁人,文博馆员,研究方向:红岩文化;金华(1975—),男,重庆南川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重庆名人文化。

时全国还有一些地区尚未解放,刚解放的重庆等地也是百废待兴,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争分夺秒地去做。因此,“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确实没有条件对每一个死难者的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4]127}“对于既不能定为烈士,也不能定为叛徒的人,我们只好暂时搁置下来,不予定性。”^{[2]200}

(三) 召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在重庆市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亲赴现场祭奠,并献上“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国家”的挽联。中午12点,追悼大会开始后,重庆军管会主任张际春宣读了236位烈士名单,并于次月为他们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此后,“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继续调查搜集死难者材料”^{[5]39}。然而,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部门的工作千头万绪,直到“文革”前也没有组织专门力量调查此事,期间只追认了尚承文等11人为烈士。“文革”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污蔑川东地下党,使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烈士们蒙受不白之冤,很多烈士家属及子女也受到株连。在这种情况下,烈士资格审查工作被迫全面停顿下来。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烈士资格审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开始,重庆军统集中营死难者家属、子女等强烈要求对1950年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列为未定性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1981年,承载“红岩英烈”研究、宣传任务的“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恳请复查未定性人员烈士资格的信,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1981年12月10日,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对重庆军统集中营死难者未定性人员烈士资格复查的通知,认为“卢光特(时任‘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副馆长)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烈士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负责”^{[6]6},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此事。

(一) 成立“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复查工作组

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后,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开展复查的相关工作。首先派人到重庆查阅历史资料,并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写成《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未定烈士的情况报告》上报四川省委。四川省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在1982年3月

召开的“全省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上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市州的组织、人事部门为调查人员提供线索和全力支持。“同时经省委批准,从8个地市委抽调了12位有经验的同志组成复查工作组”^{[6]16},在省委组织部干审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而复查工作刚开展时面临诸多困难:从1950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烈士资格审查至今,时间已过去32年,很多知情人士已经离世,健在的也有可能出现记忆偏差,不能准确说明情况;有的死难者没有任何线索,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给复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面对错综复杂、毫无头绪的复查工作,复查工作组秉持对党、对人民、对死难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广泛查阅资料,寻找、整理线索,拟出调查提纲,深入开展调查工作。

(二) 社会各界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支持

这次复查工作不仅得到了各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而且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革命老干部的关注和关怀。

在调查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情况时,复查工作组找到了雷英夫(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曾任叶剑英军事秘书)了解情况。雷英夫把自己所了解的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情况向复查工作组做了详细叙述,并打电话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请求叶剑英出面证明。雷英夫在电话中向叶剑英汇报时,叶帅热泪盈眶,非常激动,连声疾呼:“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冯传庆同志走的时候我还送他一件皮袄呢。”^{[7]380}之后,叶剑英亲笔为他们写了证明材料。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等七人于1983年被评定为烈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也为复查工作组提供了证明材料。1983年4月,中共四川仪陇县委写信给陈云,请陈云回忆其与1949年11月重庆渣滓洞大屠杀中一个叫席懋昭的仪陇籍死难者之间的交往情况。陈云回忆起当年长征途中,他受中央派遣从四川到上海恢复党组织,一位20出头的年轻地下党员护送他到重庆乘船安全出川,这位青年一路上机智勇敢的表现,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在延安再次相见。建国之后,陈云多次提到,这位青年护送他安全出川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功劳很大,还曾四处打听寻找,但一直没有结果。根据仪陇县委提供的线索,这位青年会不会就是席懋昭呢?因时间久远,陈云反复回

忆也不能确定,只回忆起这位青年当年担任过四川天全县灵关村(今四川宝兴县)小学的校长,其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为了郑重地写出有关此事的证明材料,陈云还通过各种渠道求证当年的青年是否就是席懋昭。最终,四川省委组织部证实席懋昭确曾当过灵关村小学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省委组织部还寄给陈云一张席懋昭当年的照片。看到照片,陈云连声说:就是他,就是他!1983年12月20日,陈云亲笔为席懋昭写了证明材料。他在材料中说:“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8]51}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以及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王首道、童小鹏、荣高棠等20多位领导同志在百忙之中接待了复查工作组,有的还亲笔写了证明材料。原川东特委副书记、曾任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的邓照明,为复查人员介绍了他1950年参加第一次烈士资格审查的情况,并提供了一些未定性人员的线索。原川东特委书记、时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的肖泽宽以及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韩子栋为13名死难者提供了证明材料。

死难者的家人、同学、生前好友、狱中脱险志士以及知情群众怀着对革命者的阶级友爱、深厚感情,介绍了真实情况并提供了证明材料。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与死难者出生入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鼎力支持和亲切关怀,极大地推动了烈士资格复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复查工作组认真负责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在复查工作中,12名工作人员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高度的责任感,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负责地调查取证。“在调查核实过程中,采用先近后远,先易后难;查阅档案,访问知情人士与请求提供证明材料相结合;直接派人调查取证与通过组织函调取证相结合”^{[5]41}等方式展开调查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究证据,注重调查研究。从复查工作组成立到1983年6月底这段时间里,他们“跑遍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行程30余万公里,访问了被难人员的亲属、战友、知情者1700多人,查阅了各地保存的档案、文史和党史资料近2000卷”^{[6]7}。经过对材料的整理与综合分析,解开了一个个历史谜团,还原了革命者本来的英雄形象,使他们埋名三十多年后终能得到公正待遇。兹举两例:

其一,薛传道,上海人,交通大学肄业,在重庆中央工校任校长室秘书、校友会主席、教授会常务理

事。组织成立“活力社”,参加进步教师“读书会”,主办《中工半月刊》。1949年5月被捕,同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渣滓洞。1950年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当时的材料,认为其“任过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曾发表过教育方面的论文,立场模糊,不列名”。为了调查核实薛传道的情况,复查工作组找到薛传道的妻子商育辛,原重庆中央工校教师、时任重庆建工学院副院长的乐怡然,知情人士杜炳文等人了解情况,弄清了薛传道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实情:1946年,三青团中央在庐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正在重庆中央工校任教的薛传道因为曾经参加过三青团,且在学校有极高的威望,学校就考虑派他带领学生一起参会。薛传道考虑到自1937年离开家乡上海以后已近10年未回家,平时又没有多余的经费回家探亲,而这次带领学生参会,顺便可以回家探望父母。因此,薛传道答应了学校的安排。在庐山,薛传道敢于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同时表示中国必须革新。他的一系列言论,得到很多人的赞许,薛传道自然就受到许多学生的拥护。在三青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为了笼络人心,假装民主,选举薛传道为全国候补监察干事,列最后一名。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实行党团合并,薛传道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薛传道并没有因为这个头衔而高官厚禄,他在庐山开完会后就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后来,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反动活动,相反,他经常抨击国民党,并在1949年带领师生参加“四·二一”运动,还发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这直接导致他被国民党逮捕。复查工作组在1949年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查阅到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常务会,以“薛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共产党,鼓动学潮,决议薛传道永远开除党籍。”综合以上材料,复查组认为薛传道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实为挂名,并没有从事任何反动活动。对于之前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薛传道“曾发表过教育方面的论文,立场模糊”这一定论,复查工作组在1949年3月21日的《世界日报》上查阅到这样一则报道:薛传道曾经在中央工校数百名师生参加的座谈会上公开发言说:“目前教育的失败、破产,乃由于英美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移用我国不适用所致……资本主义已趋末路,将被社会主义取代,所以将来的教育制度必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复查工作组还在1949年3月31日的《世界日报》上查阅到这样一则消息:薛传道在署

名的长篇文章《寻求新的教育思潮》中,公开揭露国民党逐渐被旧的封建性势力所腐化,日益走上了背叛革命的反动方向,认为中国社会的出路必将是在工农劳苦大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结合下曲折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复查工作组利用查阅到的文献,否认了薛传道“曾发表过教育方面的论文,立场模糊”的定论。薛传道应该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其二,唐文渊,四川广安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考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在大足、璧山等地利用国民党政府职员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1947年,为配合华蓥山武装起义,掌握敌方动态和情报,根据党的指示,在重庆中央警官学校任教官和文书科长。1948年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同年10月,在重庆北碚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殉难。1950年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以唐文渊“供出某吴姓同志”而认定其为叛徒。为了核查唐文渊的情况,复查工作组找到曾任中共地下党广安观阁特支书记的陈伯纯,与唐文渊有过接触的地下党员王代学、何正富、曾海清、严发文,以及唐文渊的发小毛良行等人了解情况,请他们提供证明材料。复查组找到了吴姓同志的妻子,她证明:“吴某某在起义失败后,转移工作于北碚,借住友人家里,不幸被反动势力与当地特务告发其行踪。”复查工作组还找到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些档案和报刊资料。在1948年8月16日国民党广安县县长呈报重庆绥靖公署的电文中称:“(8月12日)俘伤之匪徒向全忠,据供称,该股匪头领系邓致久,观阁镇参议员;吴某某,小学教员。”1948年9月的《广安县政府造册潜逃奸匪报告表》称:“吴某某,男,42岁,高中毕业,校长教员,奸党匪首。”9月8日的《新新新闻》登载的《华蓥山的匪乱》一文称:“邓匪所率之匪徒有吴某某(小学教师)……裹挟民众一百余人,自称民主联军。”唐文渊被捕时间是1948年10月,而国民党特务早在1948年8月就已经了解到吴某某是中共党员,以及试图发动武装起义的相关情况。复查工作组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材料以及档案、报刊资料,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抗战时期,唐文渊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1947年在重庆中央警官学校和兴文县政府任职期间,多次根据地下党领导同志的指示,回乡领导和检查农运、学运和建立华蓥山游击根据地的工作。1948年旧历七月初八,与观阁特支书记吴某某等人一道,亲自领导和参加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以教书为

掩护继续筹集经费购买枪支,进行革命活动,10月在北碚被捕。被捕后,没有供出组织和同志,在狱中表现甚好。至于吴某某同志被捕的原因,系国民党特务早已掌握了吴某某的身份,被特务告发其行踪所致,非唐文渊所供。对1950年审查烈士时,定唐文渊为叛徒的结论应予以否定,唐文渊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此外,胡有猷、邓惠中、盛超群、黄宁康、朱念群等人的情况在复查工作组细致入微的调查取证下,也被一一调查清楚。第二次大规模的烈士资格复查工作从1982年开始,至1986年结束。在历时4年多的复查工作中,共查清了80名死难者的问题,先后分四批追认64人为革命烈士,5人被定为叛徒。此外,还有11人因为没有任何线索和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只能留待以后再作调查。

三、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西南局与重庆市委成立专门机构对在重庆军统集中营里的321名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进行审查,确定了235名死难者为革命烈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再次组织力量,对未定性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进行复查,64名死难者被各地、各级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两次大规模烈士资格审查和复查,共有309名死难者被评定、追认为革命烈士,统称为“红岩英烈”。

参考文献:

- [1] 凌杰. 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历年死难人数考[J]. 红岩春秋,1989(增刊).
- [2] 邓照明. 巴渝鸿爪——川东地下党斗争回忆录[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 [3] 孙丹年. 歌乐山被难英烈资格审查经过[J]. 纵横,1999(7):47-50.
- [4] 厉华. 军统集中营[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5] 喇进修,李洪仁,陈南园,等. 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J]. 当代史资料,2010(3).
- [6]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红岩英烈编写组. 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7] 厉华,刘和平,王庆华,等. 魔窟——来自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8] 康培光,张正霞. 席懋昭. 几十年后被追记大功的革命烈士[J]. 红岩春秋,2012(3):48-51.

[责任编辑 文 川]